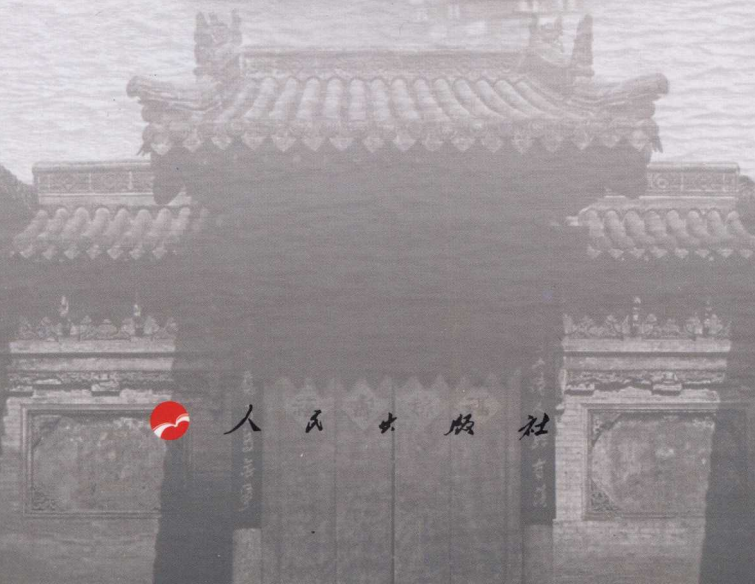


YANXISHAN HUIYILU

阎锡山 / 著
张殿兴 / 编

阎锡山 回忆录



人民出版社

KANXISHAN HUIYILU

阎锡山 / 著
张殿兴 / 编

阎锡山 回忆录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世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阎锡山回忆录/阎锡山 著. 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. 11

ISBN 978-7-01-011282-4

I. ①阎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阎(1883~1960)-回忆录 IV. ①K827=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3164 号

阎锡山回忆录

YANXISHAN HUIYI LU

阎锡山 著 张殿兴 编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)

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10

字数:109千字 印数:0,001-8,000册

ISBN 978-7-01-011282-4 定价:36.00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目 录

一、我幼年的时代背景与献身革命的经过·····	1
二、掌握山西武力与太原起义前后·····	10
三、“二次革命”的波折与民初山西的境遇·····	23
四、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的处境与观感·····	34
附录一：阎锡山传略(有删节)·····	45
附录二：阎锡山年谱·····	83
编后记·····	张殿兴 154

一、我幼年的时代背景与献身革命的经过

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（清光绪九年，公历 1883 年），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，因一切不图进步，故事事相形见绌。在我的幼年时期，中国正处于政治腐败、军事失利、经济落后、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。清政府黯于时势，当维新而不维新，有志之士咸认政府即亡国之前导、救国之障碍，无不义愤填膺，期以改造政府挽救国家为己任。但因主张不同，遂有保皇党（又称立宪党、维新党）与革命党（初称兴中会，继改组为同盟会）之分立门户。前者以康有为先生为首，主张君主立宪。后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，主张民主共和。

康有为、梁启超戊戌变法立宪，受慈禧太后之阻挠而一蹶不振。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，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驱使，为了维护子孙帝业，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。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，澎湃全国，清廷方图于癸丑（辛亥后二年）立宪，已不及措。后人每有谓“戊戌立宪，万世帝王，癸丑立宪，国破家亡”，这实在是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。

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，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，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，中国的贫穷，实以此为根因。这

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,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。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,反对奇技淫巧,即妨碍了发达物质,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。因为中国文化提倡“正德利用厚生”,“正德”是以德显能,“利用”是以物养人,“厚生”是美善人生,最注重发达物质。“孝悌力田”,即是重农。“日省月试,既禀称事,所以劝百工”,即是重工。至排斥奇技淫巧,不是指发达物质说,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。中国自古以来教民生活,不贵异物贱用物,不做无益有害,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淫巧。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。唯实现正德利用厚生,必须是天下为公的政治,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,为时一百六十余年。即变为传子,一私一切皆私。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,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,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。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,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,反遭到政府的打击。此等行为,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。继秦两千年来的政权,做法虽变,但均师其意。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,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,就是中国人民,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,不只是物质学问不能发达,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,而不是政治的产物。

中国儒家的学问,“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,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”,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,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。中国自古以来,说人民的幸福,一为寿,二为富,三为康宁,四为攸好德,五为考终命。亦必须加大生产力,真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,其余寿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。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。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,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,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。明末李自成

造反,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。

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,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。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,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、耗竭人脑力的能事了。我就读私塾时,尚习作八股文,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,有时苦思终日,写不出一个字来。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,有阶梯。所以我常说: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,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。

我十九岁时(清光绪二十七年,公历1901年)为时势所驱,认为欲有补时艰,有济国危,只有投笔从戎,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。越三年,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。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,其中我和姚以价、张维清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,其余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。当出国之前,山西巡抚(俗称抚台),张曾敷等所谓五大宪(抚台、藩台、臬台、学台、道台)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: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,以免误入歧途。提到孙中山先生,尤其极尽诋毁之能事。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,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!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,谦虚和蔼,人少事理。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,骄横傲慢,人多事废,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。比至旧本之初,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,中国何以国大而弱,不断在脑中萦回,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,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。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,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,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《中国魂》,益谥知清廷之腐败无能,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,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,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。

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。我闻其说,奋然兴起,

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。翌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,公历1905年)中国革命同盟会(简称“同盟会”)在东京成立,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,均为同盟会会员。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,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,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,则自觉判若两人。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,如落后了时代,则所培植之人才,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。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余人,超过前五批的总和,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,但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,也多是这第六批留学生,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。

我们在日本时,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,并禁止革命书刊,日本政府未予接受。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,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,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南洋大臣端方,要求他们停止残杀,如不接受,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换他们两人的生命。我们返国之后,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,须以留学生为主干,二则因我们对袁世凯、端方的神经战,使他们有了戒心,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地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。

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建立民国,平均地权”四句话,我对“平均地权”这一句话的意义不甚了解,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。他告诉我说:“平均地权的‘权’字,不是量,也不是质,这也就是说,不是说地亩多少,也不是说地质好坏,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。”我听了说:“我还不明白。”他说: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,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,可以说不值一个钱,现在因繁盛起来,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。”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,还是公尺,但我曾问:“美国也是花银子,说两数吗?”他说:“不是,美国的货币,名叫套如,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

子,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,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,所以我和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。”我说:“那么,你所说的‘平均地权’,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?”他笑了笑说:“你说对了。”他继续说:“原来一文不值,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,不是人力为的,也不是造化予的,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,不应当让地主享有,应该由国家享有。”我说: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又说:“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,世界上太多了。就我们中国说,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广州都是这样,而且还在继续发展,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。”我接着问:“商埠码头可以如此,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?”他说:“凡有此种事实者,均应如此。”我又问:“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?”他说:“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。”我复问:“因人力改良而增长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?”他说:“不可,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。”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,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,中山先生问我:你明白了吗?总在十次以上,那一种淳淳海人的亲切态度。至今思之,尤觉敬服不置。

我加入同盟会之后,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,以保身份之机密,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,负起革命实施之责。此组织定名为“铁血丈夫团”,盖取孟子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之义。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,山西即有温寿泉、张瑜、乔煦与我四人,其他如浙江黄郛、江西李烈钧、陕西张凤翔、云南罗佩金、湖北孔庚等,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。

我在日本留学,于东京振武学校肄业两年半,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,东京士官学校肄业一年半。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,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。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

不与日本学生同住,且上课亦不在一起,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,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。在此五年中,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,开展革命工作。暇时常与李烈钧、唐继尧、李根源、朱绶光等分析时事,研究政情,并曾编著《革命军操典》与《革命军战法》。《革命军操典》注重编制之改善,《革命军战法》则注重夜战,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。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,故每逢考试,辄以意为之,尤其算术一课,多不按公式计算,虽得数能对,老师亦仅给及格分数。

我留日期间,正值明治维新,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。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,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,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,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。另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,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。

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,也使人十分感佩。我在士官学校时,有一次舍营,演习之后,汗透重衣,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,让我们穿上,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,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,吃了晚饭之后,向我们说:“你们早点睡吧,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,叫你们起来,为你们预备早餐,不用你们操心。”

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,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,若敬神然。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?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:“敌人的军队来了。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,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,你与其敬神,莫如敬军人。”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。

日本维新,以发扬武士道、提高军人精神,为其主要目标。我到日本的头两年,正值日俄战争时期,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:俄国是一个大国,军队装备又好(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,战场上

掳获俄国制造者,始行仿造),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?他说:有。我说:你这话有何根据?他说: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,常常说:你再不听话,就送你到军官学校。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,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。但凡事过犹不及,这一段时期,在尚武上俄国是不过,日本是过,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,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,由于军人骄横,自由行动,亦难免失败。

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,日俄战后即渐渐减退。因为战争一结束,社会党(社会上称之为“过激党”)的传单逢军人即散,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,比如说,你们军人死了许多,为日本换来了什么?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。在此种煽动下,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。

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,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。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,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。有一次,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,因被日政府下狱,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。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,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,我遂佯装患病,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(亦社会党人)诊断,允准住院。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,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,除了医院费用,所余九百日元,悉交大衫岩夫人。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,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,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。

民国纪元前六年(清光绪三十二年,公历1906年)奉中山先生之命,偕盟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,返国布置华北革命。至上海港口时,因知海关检查甚严,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,并向赵君说:“如检出来,我一人当之,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。

检查时,我站在前列,你站后列。”赵君说:“我站前列,你站后列如何?”我说:“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,易被注视,仍我站前列为宜。”果然,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,我遂得渡此难关。其后我向赵君说:“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,畏缩则引人生疑。”行抵汉口,在一家旅馆中,很凑巧地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:“事到难为宜放胆”,“人非知己莫谈心”。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,若非革命党人,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。回晋后,在家中住了五天,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,向各处学生、教师、商人、僧侣运动革命,历时三月,复赴日本。

其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阶段,看见上海报载,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,兴奋之余,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,因为那时我的《革命军战法》已经编成,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,对我的《革命军战法》实际作一试验。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,当批驳之条呈发下,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。于今思之,方觉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。

民国纪元前三年(清宣统元年,公历1909年)毕业返国,绕道朝鲜旅行,经京城(今汉城)时,适逢朝鲜大臣下朝,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,且每行数步,即掉头向我窃视,其状如鼠之畏猫然。因我穿的是西装,与日本人无大分别。一望朝鲜大臣之可怜模样,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,以故未敢坦行,亦未敢直视。住旅馆后,朝鲜报社记者来访,最后含泪无言而别。至平壤,见有一座建筑崭新的楼房,经询问获知为妓女学校。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,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,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,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,大声疾呼地提出“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”的口号。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,曾发动山西各界

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，由冯曦领导，前往韩国参观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，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。

二、掌握山西武力与太原起义前后

同盟会因为种种关系,把革命任务分开了江南、江北两部分。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,大家都主张在江南。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,发动起来,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;另一方面江南有海口,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,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江北为高。因此,江南、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。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,山西出兵石家庄,接援革命军北上,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决策。

当辛亥革命的前夕,山西军队分新军与旧军两部。新军为一个混成协(旅),下辖步兵两标(团),骑兵炮兵各一营,工兵辎重兵各一队(连),姚鸿发任协统(旅长)后,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,炮兵营和辎重兵队拨归二标代管,全协共四千余人,悉驻太原。旧军为巡防队十三个营,亦共为四千余人,除分驻绥远、大同、代州(代县)、平阳(临汾)者外,驻太原者计三个营。旧军保守太甚,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,新军则大半为我与我的盟友或同学所统率。我回晋之初,被派为山西陆军学校教官,三阅月升任监督,旋为实际掌握新军,以种种努力,获调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员(中校团附),一年后升任标统(团长)。这时一二两标虽改名为八十

五标与八十六标,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称之。其间清廷于北京举办留学生朝考,我遵命前往应试,得中举人。

那时山西军中的山西籍人不过十分之二,且多是所谓“老营混子”。我于就任标统后,为使新军易于掌握,且易成为有朝气、有团力之革命武力,于是提倡征兵,山西巡抚丁宝铨与新军协统姚鸿发咸表赞同。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为事实,则尤应特别归功于山西咨议局局长梁善济的支持。征兵制度实行之年,新军步兵两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员即皆成为山西籍的劳动农工。其明年,新兵与旧兵就成为八与二之比了。

姚协统鸿发虽非革命党人,但与我交情甚笃。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(主全省兵事者)后,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,我出五千两银子,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。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(次长),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关说此事,甚有把握。丁巡抚宝铨、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。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,离得下层远了,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,掌握革命行动,遂婉谢之。

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,我与盟友赵戴文、温寿泉、南桂馨、张瑜、乔煦、常越日夜密谋,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,表面上研究学术,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,暗中鼓励革命;一面组织模范队,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,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。

我第一次回国时由日本带回之炸弹,一直由我们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。本来打算以一颗由王建基飞徐翰文携绥远,一颗留太原,俟秋季祭孔时,同时分炸绥远将军与山西巡抚。嗣经再三斟酌,此种举动之后果,非我们所能把握,不若运用军队成功,再举义旗,在革命前途上更为有利,且能符合同盟会全盘革命计划,遂即决定中止。

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,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,在太原起义。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,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,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。在山西巡抚陆钟琪于武昌起义后,特召其子亮臣来晋,作缓和革命之计。亮臣与我是日本官士学校同学,但属泛泛之交,主张亦不接近,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,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。他到晋翌晨,即访我谈话。一见面就说:“我此次来,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。兄有意见,弟对家父尚可转移。”我当时答复他说:“武昌事件的真相,我尚不知,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,抑系别有原因,我也不明白。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,还有点太早。”他又说:“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,不过我可以和你说,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,我也能设法。”我笑了笑说:“这话说得哪里去了,你来,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。”他临行时,又和我说:“过两天,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(姚鸿发字)一起谈谈?”我说:“可以,你通知他,还是我通知他?”他说:“我通知吧。”

在这时候,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。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,要借给河南三千支,随带子弹,且已运走一部分。另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,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。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:“亮臣曾否来访?”他说:“来过了,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,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?”我说:“总办决定吧!”我辞出后,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,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,已决定赶紧实行。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,完全是想敷衍住我,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。而此等计划,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,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谋者。

我从督练公所回来,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,一见面就问我：“陆公子来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。”他说：“可靠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,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,作我们决策的依据。”他接着问：“你看他究竟来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,完成运枪开兵的事,然后静观革命情势的发展,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,拥戴上他父亲,联合上大家,作一个突变,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。”他说：“事既如此急迫,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？”我说：“革命是个危险事,与大家谋,不易成功,反易泄露。”

这段话谈完之后,我就与赵戴文同志估计了一下我们在新军中可能使用的力量,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(营长)张瑜、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,只有瑞墉是个旗人,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,行动的时候,只要把瑞墉一个人囚禁起来,即无其他顾虑。骑炮营是些老军人,不赞成,也不会反对,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(班长)是我们的同志,可能控制该营。工辘队虽不同情,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,且人数又少,关系不大。需要特别注意的,只有一标,因为一标的黄国梁标统与我私交虽好,但不是同志,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、姚以价、熊国斌亦然,故只能从下边运用,因为队官(连长)与头目之间,我们的同志还不少。研究到这里,赵戴文同志说：“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么？他虽然是保皇党,但保皇党已无前途,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但按他的性情,不加逼迫,他不愿冒险,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,就是因为不愿冒险,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。”

越数日,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,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(阳历10月29日)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,认为起义的时